

上海三联文库

文学的维度

学术系列

文学的维度

著 者/南 帆

责任编辑/汪 宇

装帧设计/鲁建德

责任制作/沈 鹰

责任校对/张大伟

出 版/上海三联书店

(200233)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三联书店

制 版/上海市印刷四厂

印 刷/江苏吴县文化印刷厂

装 订/江苏吴县文化印刷厂

版 次/199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260 千字

印 张/11.25

印 数/1—5000

ISBN7-5426-1055-4
I·141 定价 16.80 元

目 录

第一章 语言、文学和真实

引言	1
一 语言的魔力:塑造和囚禁	2
二 文学话语的维度	24
三 真、现实主义与所指	43
四 语言现实主义	69

第二章 修辞

引言	91
一 修辞:话语系统与权力	92
二 反讽:结构与语境	114
三 第一人称:叙述者与角色	136
四 躯体修辞学:肖像与性	158

第三章 叙事话语

引言	183
一 叙事的幻觉:新写实主义	184
二 再叙事:先锋小说的境地	202

三 叙事话语的颠覆:历史和文学	225
四 影响与转换	249

第四章 文类

引言	271
一 文类与散文	272
二 抒情话语与抒情诗	291
三 学院与批评	310
四 话语与影像	332
后记	356

第一章 语言、文学和真实

引 言

现今,一部文学巨著的诞生可能被形容为意味深长的语言事件,一场汹涌的文学革命可能被描述为社会话语内部的语言地震。愈来愈多的人看来,文学是一种特殊组织的话语系统;文学的意义将参照一个社会的语言形势图给予鉴定。这并不是贬抑文学,埋没文学的光辉。相反,这意味着一个崭新的立场和文学的再认识。二十世纪的“语言转向”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后果:语言跃居为诸多人文学科的主角,成了思想展开的发轫之点。人们已经意识到,没有任何一种思想能够悬空地存留于语言空间之外。事实上,语言是组成一个社会人文环境的基本粒子。作为一种表意和交流的符号系统,语言容纳了人类精神的所有可能,同时也划出了一道不可跨越的精神地平线。处于社会话语的光谱之中,文学话语向来以活跃、变革和富于生气著称;于是,文学话语与诸多话语系统之间的角逐、抗衡、冲突、融汇形成了它参与现实的独特形式。

这样,人们有必要事先引入一个更大的语言背景予以考察。这将使人们看到,文学是在什么场所之中展开,同时又是从什么场所之中突围而出——人们就是在这样的展开和突围之中发现了文学的基本功能。

一 语言的魔力：塑造和囚禁

(一)

每一个体成为社会成员的必要条件之一是，纳入这一社会的语言体系。语言体系是凝聚一个社会的基本网络。对于个体而言，语言是一个神秘的符号之网。语言可以潜入最为隐密的社会角落，辗转于人们的口吻之间；同时，语言又可能不尽地延伸，无限扩展，成为个体所不可摇撼的巨大结构。语言并非类似于山川河流的自然物；语言是一种人工制品。但是，人们不可能像对待另一些人工制品——诸如斧头、汽车乃至航天飞机——一样对待语言。语言的神秘性质时常迷惑了人们。即使在当今的理性社会，种种分解语言的手段远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不仅仅是语言学家在考虑这样的问题：语言是什么？

这个问题的历史已经十分悠久。语言起源的真相埋藏在众说纷纭之后，难以核实。也许，神秘之物总是和不可思议的魔力联系在一起的。对于原始的初民说来，语言如同一个魔具。它更像是一个法力无边的天授之物。那些古老的传说之中，语言的出现时常被当作一个异乎寻常的事件。《淮南子·本经训》记载：“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当时的人们已经意识到，语言和文字包含了惊天动地的不凡威力。许多宗教教义都曾经将语言看作创世的工具。《旧约·创世纪》告诉人们，上帝所使用的语词具有奇妙的神力。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光就出现了；上帝说，水里要有生物，空中要有飞鸟，地上要生出活物来，于是，这个世界随即万物纷呈，生机勃勃。在这里，语词显出了至高的权力——它是实在世界之母。另一些时候，语言甚至出现了僭越上帝的威胁——这就是《圣经》里巴比伦塔的故事。这

个故事的情节意味深长：挪亚的子孙企图建起一座通天塔，他们操持同一种语言，齐心协力，彼此呼应；他们所体现出的力量让上帝感到了不安，于是，耶和华变乱了他们的口音，使之无法互相配合。巴比伦塔的故事无宁说是一个象征：这个故事从反面暗示了语言对于人类的左右。

“语言的魔力”不是一个夸张的形容，这无宁说证明了语言以何种独异的形式参与人类现实。所谓“参与”，也就是显明语言怎样介入现实的各个层面，制定社会成员的精神空间，延续特定的意识形态，维护或者破坏既有的价值体系，调节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位置，给出人类感觉和经验的模式，提供认识实在的中介，如此等等。例如，语言对于实在的命名亦即是人类记忆实在的提示；语法规则规范了人类意识的基本框架，“神”、“天堂”、“负数”、“形而上学”这些概念致使种种超验的内容获得了栖身的躯壳。“语言的魔力”意味着语言对于人类居高临下的统治，这种统治往往达到这样的程度：人类不再将语言视为意识与实在之间的中介——人类将语言当作实在本身。

卡西尔在《语词的魔力》一文之中曾经发现：诸多神话之中，语词无不处于至高的位置——“太初有词”。在原始人那里，语词和指称物之间通常具有同一性。由于语词的崇拜，“凡被名称所固定的东西，不但是实在的，而且就是实在。”^①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列举了众多例子证实，原始人通常将语言与实在视为一体。对于原始人说来，“没有哪种知觉不包含在神秘的复合中，没有哪个现象只是现象，没有哪个符号只是符号；那么，词又怎么能够简单的是词呢？”符号体现出种种神秘的力量，“神秘力量不仅为专有名词所固有，而且也为其他一切名词所固有。”在原始人的心目中，“言语中有魔力的影响，因此，对待言语必须小心谨慎。”^②事实上，敬畏语言已经在许多社会成为一个秘密

传统。人们可以从“敬惜字纸”的风俗之中发现这个传统，字纸上的文字曾经被看作孔子的眼睛；人们还可以从某些作家的想象资源之中发现这个传统——譬如，博尔赫斯在《皇宫的寓言》这篇小说里讲述了一个奇妙的故事：黄帝带领一个诗人游览了梦幻一般的皇宫，诗人对于诸多金碧辉煌的景象无动于衷。他在游览结束的时候吟诵了一篇短短的诗作，皇宫即刻消失了，一切如同被诗的最后一个音节抹掉了一样。当然，诗人终于被黄帝杀害了，可是，诗人说出的那个“包含着整个宇宙的字”却是人类的一个永恒的诱惑。人们的想象深处隐藏着一个秘密的期望：说不定什么时候，语词的魔力可能再造一个栩栩如生的宇宙。

也许，理性社会已经很难察觉语言的魔力。这种魔力正在和神话一道成为遗迹。如今，人们对于自身的智力有了足够的自信，人们自认为可以任意地操纵、驱遣语词了。经历了无数的聚谈、吹嘘、威胁、恐吓、欺骗，经历了种种撕毁盟约、违背合同、出尔反尔，人们已经难以继续慎重地对待语言。语言不再意味着兑现，人们不再顾虑它即刻会转化为实在。语言似乎变得轻贱了。只有那些特殊的话语类型——例如誓言、咒语、祈祷、谶言——还提示着语言曾经有过的赫然威仪。誓言意味着一种语言的承诺，宣誓者违背这种承诺将遭受可怕的报应；谶言提前预告了将要来临的事件，所谓“立言于前，有征于后”；祈祷和咒语均表述了言说者的强烈意愿，这种意愿可能通过反复的言说而成为事实。不难看出，这些话语类型仍旧建立在一个古老的基础上：语言可以转化为实在，或者语言就是实在。或许人们还能看到某些人对于姓名的刻意推敲，看到某些字眼谐音所引致的迷信，看到某些数字的禁忌——除此之外，语言的魔力正在全面衰退。

然而，不论是社会管理、文化承传还是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交往，语言的轻贱都将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为了驱散这样的不安，一种维持语言魔力的努力出现了。在我看来，这种努力很可能是造就语言伦理学的重要源头之一。不难发现，语言伦理学很大程度地围绕着语言与实践的关系——亦即“言”与“行”——展开。人们可以从古代思想家的言辞之中查到大量“言”、“行”关系的论述：

子夏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论语·学而》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论语·里仁》

……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

——《论语·颜渊》

……曰：“言必信，行必果，……”

——《论语·子路》

子曰：“君子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惮也，言足信也。……”

——《礼记·表记》

“儒有居处其难，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

.....”

——《礼记·儒行》

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
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无信，何以为言？信之所
以为信者，道也。信而无道，何以为信？道之贵者时，
其行势也。

——《春秋谷梁传·闵公二十二年》

显而易见，在古人那里，一言九鼎成为语言伦理学所推重的楷模，而轻诺寡信则是难以容忍的恶劣品质。这是担忧语言魔力的衰退而采用的道德弥补措施。尽管语言学的常识已经显明，语言与实在、词与物之间的分裂不可避免，但是，人们还是企图从另一个方面信赖语言——人们不想让话语主体从夸夸其谈背后隐身而去，留下一堆语辞组成的空头支票；换言之，人们仍然想让话语主体在他所描述的实在之中充任预定的角色。至少在语言与话语主体的关系上面，语言必须保持着折算为实在的可靠信誉。在“言”与“行”的关系上面体现出何种道德水平，这是一个社会成员品行鉴定的重要尺度。在这个意义上，人格的完善包含了对于语言魔力的某种认可。这时，语言伦理学甚至介入了一个社会最为显赫的区域：政治。对于参加选举的公众说来，言而无信的人显然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

确实，语言的魔力早已在政治领域产生了种种不可低估的作用。这是语言参与现实的又一个具体例证。许多时候，语言的魔力体现为政治机构对于社会成员的凝聚、号召、激励、规约，仅仅语言就能够使万众一心，情绪昂扬。卡西尔发现，政治理论之中的神话思维从未彻底消失；某些关键的时刻，神话思维可能

轻而易举地淹没理性和逻辑思维。这样的時候，语言的魔力将在神话的气氛之中得到了放大。通常，人们的语言包含了描述功能和情感功能；“可是，在政治神话所提出的语言中，这种平衡完全被打破了。整个强调的重点倒向情感方面，描述性和逻辑性的语词被转化为魔语。新的名词被杜撰出来，旧的名词的意义也大为改观。”^③人们可以察觉，政治家通常善于使用大字眼。这些大字眼不是一个简单的命名，一个涵义明晰的概念；相反，许多大字眼可能难于定义，内涵与外延含混模糊。但是，当语言的魔力产生作用的时候，含混与模糊恰恰幻化成为一种诱惑人们的神话图景。人们可以在口号和标语之中看到语言魔力的极致。口号和标语常常以“国家”、“阶级”、“战争”、“和平”以及种种“主义”作为主题词。语言的魔力消弥了概念抽象所产生的隔阂；人们无宁说是用肌肉、神经、骨骼、血液和巨大的激情承受这些大字眼。呼喊口号的时候，理性思辨已被抛弃；种种斤斤计较的分析徒然令人耻笑。语言魔力的蛊惑将抑制乃至取消种种个性。口号能够迅速地制造同仇敌忾的氛围，或者将所有人的兴奋调整到相同的节奏之上。不论每一个人的来历多么不同，一个响亮的口号立即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站立的语言横切面。作为一种话语轴心，一种召唤，一种振奋人心的社会主题概括，一种集合人心的标志，口号典型地展现了语言的魔力在政治领域可能产生多大的奇迹。

这个意义上，语言的魔力必将成为众多方面共同觊觎的对象。角逐展开之后，政治机构通常将控制话语生产权作为一个重要策略。这是语言魔力的因势利导所依据的制高点。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话语的生产也就是实在的生产。因此，无论是巫师嘴里说出的神谕、皇帝的金口玉言还是现代社会权威机构的标准言论和规范口径，权力严密地监督着话语生产。显而易见，这

是政治机构对于语言魔力的掌握,也是政治机构对于语言魔力的防范。

(二)

现在,我必须将视域转移到同一个问题的背面——我有理由指出,汉语文化同时还存在着否弃语言崇拜的强烈倾向。人们意识到语言在主体和客体之间所处的位置;语言的过度膨胀势必阻断主体与和客体的依存关系,语言将从中介物上升为主角。对于一些思想家说来,这显然是一种难以接受的本末倒置。也许,不同学派的思想家持有不同的动机和立场,但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主张破除语言的魔力,削弱语言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遏制语言崇拜所产生的副作用。

孔子曾经说过:“辞达而已矣。”这句话时常被当作否定语言推敲的一个重要论据。也许,这句话的语气的确表明,孔子对于偏执的语言狂热没有兴趣。虽然孔子也表述过“不学诗,无以言”这样的论点,但是,作为“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倡导,孔子决不愿意语言问题喧宾夺主,从而干扰了教化的基本目标。所以,尽管苏东坡擅自将“辞达”诠释为“求物之妙,如系风捕景,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而且“辞达”是“千万人而不一遇”的境界,^④我仍然愿意认为,这更像是一个作家的借题发挥。事实上,在文学的范围之外,墨子式的“非乐”和韩非子“以文害用”的恐惧得到了更多的呼应。

不难发现,上述观点共同将语言定位为一种工具。这种工具负责主体与主体、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交流或者沟通。但是,如果这种工具过份精致以至于夺人耳目,那么,工具就会从交流的手段变为交流的目的。在这里,如何保持主人与工具的主从关系引致一些思想家的高度警觉。老子和庄子的诸多言论均在于

提示人们，不该让工具——哪怕是在美学的意义上——僭越和篡权，从而无形地成为交流过程的一个障碍性遮蔽。交流的主体必须尽快穿过语言，毫无阻拦地抵达交流对象。老子的《道德经》谆谆教诲人们：“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巧若拙，大辩若讷”；“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庄子对于语言工具有着更为细腻也更为辩证的考虑，人们对于这些名言几乎耳熟能详：

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外物》

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

——《天道》

轮扁……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天道》

汉语文化之中,老子与庄子的言论始终是一种不可抑制的思想势力。众多后继的思想家接过这些言论,使之在不同的层面上绽出了种种智慧之花。老子和庄子对于语言的机智观点曾经启迪了佛家和道家。他们洞察到“言语道断”的危险,竭力破除语言对于“道”的干扰乃至干预。为了避免拘执于语言工具而迷失本源,佛家甚至出现了拈花微笑或者当头棒喝这样奇特的布“道”方式。如果说,佛家和道家企图废弃语言而悟道,那么,作家至少知道,语言是他们无法挣脱的镣铐。没有语言符号的文学是不存在的。但是,这并没有使语言崇拜成为汉语文学的首要特征。相反,文学批评史上逐渐形成了“言不尽意”的共识。“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这表明了作家面对语言的特殊姿态。作家坚持将主体视为语言之上的一个精神实体;语言只能尾随而不可能穷尽这个精神实体。庄子的“忘荃”、“忘蹄”之说无疑为这样的幻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依据。

不难猜想,“言不尽意”的命题首先来自作家写作所遭遇的普遍阻碍——诸多作家均体会到“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的痛苦。在他们那里,语言仍旧不是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通常,“言”几乎不可能尽善尽美地显现“意”的丰富、独特和微妙。“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这是作家搁笔之后留下的共同浩叹。可以看到,文学批评史上记载了许多类似的表述:

恒患意不称物,言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

——陆机《文赋》

……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义在咫尺而思隔山河。

——刘勰《文心雕龙》

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展转隔碍，虽写得畅显，已恐不如口舌矣，况能如心之所存乎？

——袁宗道《论文》

意中之言，而口不能言；口能言之，而意又不可解。

——叶燮《原诗》

可以看到，这些表述早已在语言之外为主体预订了一个席位。人们没有意识到，主体来自语言的建构，主体即是语言的构造物；撤消了语言，主体将成为一个毫无内容的空洞。人们通常形象地构思，“意”业已事先寄存于灵魂之中，“言”只能是“意”的仆从——“言”的功能就在于追摹、复述或者再现“意”。上述构思将主体视为意义之源，这体现了一种朴素而又古老的人本主义。这样的人本主义从未产生怀疑：“意”并不可能由某种先于语言的元素组成，并且在语言符号的辖制之外自由地飞翔。在这个意义上，“言不尽意”无形地产生了抵制语言崇拜的效能。

有趣的是，即使在某些语言崇拜的现象后面，人们仍然能同时发现遏制语言崇拜的努力——我指的是古典诗学之中的“炼字炼句”。古典诗学留下了大量“炼字炼句”的记载。杜甫的“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或者卢延让的“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都成为自述诗人甘苦的名言。不少诗话词话津津乐道于“诗眼”的琢磨和收集“一字师”的佳话。殚精竭虑地推敲字句已经成了古典诗学的一个强大传统。然而，熟知古典诗学的人同时还了解，不少诗人对于“炼字炼句”颇有微词。他们认为，辞句的寻寻觅觅仅仅是一种局部的雕琢，这一类型的诗作纤巧玲珑而缺乏宽敞浑厚的风格。诗人的宏大怀抱和出众才智必定

不屑于为语言所统治。如果语言崇拜导致痴迷的字斟句酌,那么,人们只能看到一种拘于细部的局促。所以,这样的观点得到了诸多批评家的共同认可:“诗语大忌用工太过。盖炼句胜则意必不足。语工而意不足,则格力必弱,此自然之理也。”^⑤为了协调“炼字炼句”与刻意求工之间的矛盾,这终于导致了古典诗学的一个特殊策略:“极炼如不炼”^⑥换一句话说,“炼字炼句”的一个后果就在于,诗人必须将诗句涂抹得让人看不出锤炼的痕迹为止。这就是苏东坡所谓的“渐老渐熟,乃造平淡。”^⑦这种特殊的策略将使诗作在精心制作之后仍然保持一种自然天真的风格。在诸多诗人的心目中,自然天真的美学风格远比“错采镂金”更为可贵。显然,从“炼字炼句”的推崇到“复归于朴”、“法天贵真”,^⑧这包含了文学观念的一个迂回认识;在这样的观念转换之中,人们再度发现了老子和庄子所提供的思想资源。

谈论汉语文化之中的语言崇拜与破除语言魔力,人们不可能不联想到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辩。这是一场意义深远的辩论。尽管欧阳建曾经写下《言尽意论》宣谕自己的主张,尽管欧阳建通过“名逐物迁,言因理而变;此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与为二矣”来反驳“言不尽意”之说,但是,人们无宁说更多地接受了王弼的观点。王弼借助《周易》的阐释设定“言”、“象”、“意”的依次顺序和相互关系。《周易略例·明象》指出: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

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

在王弼设定的“言”、“象”、“意”关系图之中，“言”仅仅是阐释“象”的初级工具，“意”是“象”所隐喻的最终目标。虽然这仅仅是王弼对于《周易》的解说，可是，这三者的关系不但指定了语言的位置，而且还规约了语言参与现实的范围。这个关系图之中，语言崇拜已经解除——王弼不过为语言安排了一个叨陪末座的席位。

(三)

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已经得到了语言史、文学史以及哲学史和社会运动史的共同描述。的确，这是一个意义非凡的转折。白话文运动撼动了社会文化的诸多层面，波及四面八方。如果考虑到语言对于现实的参与和介入，那么，白话文运动包含着一种强大的吁求——强势语言的重新认定表明了社会结构的重大改变；那些行使白话的语言主体已经无法满足于旧有的社会位置，他们正势不可遏地浮出地表。封建社会的终结必将中止陈旧的社会关系结构，既有的文化结构不得不为之改观。这样，白话与文言之争成了一个导火索，这是语言与现实之间深刻的互动关系带来的必然后果。这个意义上，白话文运动远非一个语言学事件。这场运动是一个社会阶层企图走到文化前台的具体象征。当然，这种社会关系的内部振荡不可能赤裸裸地呈现出来；它将经由种种复杂的中介曲折地展示在文化运动之中，并且为这些中介的固有特征所改写。人们可以看到一个复杂的